

流动的老年与虚拟的社交:随迁老人 微信社会支持研究

庄 曦

〔摘 要〕 随迁老人群体规模的迅速增长与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连。在流动性、老龄化、数字化交叠的城市空间,随迁老人群体在随子女迁徙的过程中面临着脱嵌与再嵌入的困境。相较于非随迁老人,随迁老人的微信使用总体更为熟练;微信在其生活中起到了增权益能的作用,尤其是以社交补位的方式,帮助该群体于虚拟空间弥合实体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线下关系的再聚合与再拓展;但技术的普及与使用是一个不均衡的赋权过程,现实个体差异仍然影响着该群体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资源与支持的获取。如何让仍在负重前行的随迁老人老有所依,应有赖于线上线下多元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及代际、友辈间多维的深度沟通。

〔关键词〕 随迁老人;微信;虚拟社区;互联网社会支持

一、研究缘起

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本语境之下,“民之为农者,莫不重迁”,地缘与血缘在一定程度上交织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乡土结构关系。“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因缘固定了……”^①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介入与推进,社会功能性需求的变迁带来了人口流动的加速与社会生态的重组,其最微观且直接的呈现即在于单元家庭结构的变迁。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输出加速,更多个体进入各类企业单位工作,赚取劳动报酬,然后从市场购买生存所需的产品与服务,而不再依赖原生家庭来实现抚养、赡养等功能。加之住房、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变迁,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导。

然而近十年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常态性发展以及“独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后的子女一代)婚育高峰的到来,城市中又开始出现由核心家庭向临时型、候鸟型的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回归的趋势,即子女因生活成本或婚育压力等诸多因素,将家乡的父母接到小家临时或长期同住,代为照管家务、照看孙辈,重新回到三代合住的家庭模式。“老漂族”或“随迁老人”等词汇逐渐出现在媒体及学术文本中。

庄曦,传播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乡村社区传播的数字化转型与效能评估研究”(23AXW006)的研究成果。

①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2 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群占总人口数的 18.7%,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群占总人口数的 13.5%,^①而 2000 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 10.2%与 6.96%。^②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老漂族”“随迁老人”群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数据显示,国内有流动老人近 1800 万,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的 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 43%。^③随迁老人在随子女迁徙的过程中离土或离乡,从既有的生活语境中脱嵌,又在子女居住的城市面临着社区融入、代际间交流、价值观念冲突等诸多嵌入的困境。对这部分流动老年群体而言,如何在城市中寻找、搭建顺畅有效的沟通与交往网络,已成为重要的命题。

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即时通讯软件使用门槛的不断降低,老年群体日常社交网络的拓展与维系、服务与资源的获取慢慢从线下延伸至线上,从而可能拥有新建的社会联系和支持资源。《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显示,^④聊天(71.3%)、看新闻(68.2%)、听歌追剧(50.4%)是该群体最主要的三种上网活动,超八成老人常通过社交软件和子女联系,微信等平台是获取网络知识的重要渠道。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际互动和交流方式。“持续交往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产生了‘虚拟社区’或‘虚拟空间’,成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特殊社会互动场所。”^⑤互联网社交对于实体空间人际交往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作为当下老年群体中特殊的流动一族,随迁老人对于即时通讯的使用可否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实中“交流的无奈”?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能否帮助随迁老人在陌生的城市语境下于虚拟空间中获得社会支持?这是本文想集中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 城市随迁老人的概念界定

虽然“老漂族”或“随迁老人”的称呼在日常的媒介文本中已较为常见,但其界定目前仍没有统一的标准。既有文献中,“老漂族”多被界定为“人到老年还要离开故土家园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那些老年人”,^⑥“为了照顾孙辈而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生活的老龄群体”。^⑦关于“老漂族”的界定大多突出了他们离家到城市照顾儿辈的特点,对于其流出地多未作明确的限定。

而有关随迁老人的界定则多将其流出地限定为农村,如“随子女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生活的拥有农村户籍的公民”^⑧，“因照看小孩之需而从农村迁入城市的老年人”^⑨，“随迁老人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乡村,随子女寄居于‘陌生的’城市”。^⑩从这部分老人的角色定位来看,其迁徙行为大多为从属型

①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2021-05-11, 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2023-05-20。

②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2001-05-15, 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1984.html, 2023-05-20。

③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2016-10-20, <http://www.nhc.gov.cn/rkjcyjtzs/pgzdt/201610/57cf8a2bbafe4b4d9a7be10d10ae5ecf.shtml>, 2023-05-20。

④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腾讯政务舆情部:《图解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2018-06-28, <http://www.rmzxb.com.cn/c/2018-07-03/2101724.shtml>, 2023-05-20。

⑤边燕杰、雷鸣:《虚实之间:社会资本从虚拟空间到实体空间的转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⑥刘庆:《“老漂族”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西北人口》2012年第4期。

⑦何惠亭:《代际关系视角下老漂族的城市适应研究》,《前沿》2014年第9期。

⑧李立、张兆年、张春兰:《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与社区融入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1期。

⑨李敏芳:《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研究述评》,《老龄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张新文、杜春林、赵婕:《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迁徙,与因打工等因素主动流动的老年群体性质不同。

在当下的研究界定中,随迁老人多被限定为户籍在农村的老人,实则随子女被动迁徙的老年群体并不局限于农村老年群体,还有相当多的城市老年群体随子女在城际间流动。因此,本研究更倾向于使用“随迁老人”的概念来指代为了照顾儿辈、孙辈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生活,但户籍仍在老家(农村或城市)的流动老年群体。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确定了当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第一章总则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综上,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年龄在60周岁以上,为了照顾儿辈、孙辈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生活,但户籍仍在老家(农村或城市)的流动老年群体。

(二) 老年群体与互联网社会支持

在社会学及心理学的早期研究中,社会支持的研究取向与社会分化、社会隔离以及发展心理学中的情感依恋等议题交织在一起。^①从微观呼应到关系网络的支持,“社会支持”的涵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丰富的。

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被提出,意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中的情感互动和信息交换等行为,所感受到的被关爱、被尊重和提高团队归属感的体验。^②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支持,常被看作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帮扶性社会行为。在心理学研究中,社会支持往往与幸福感、心理健康紧密相连。随着多学科关于社会支持研究议题的深入,社会支持逐渐发展为一个既包括个体内在认知又与外部环境有着多重互动维度的概念,其“元构造”(meta-construct)的学术意义不断凸显。^③

社会支持的展开离不开人际交往与互动,而社会网络的构建,亦需要成员间的传播与互动方能达成,其本质上具有一定的传播属性。因此,在伯莱森等学者看来,社会支持的研究最终会指向传播。^④随着线上社区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在技术的推动之下,社会支持的场域从线下不断向互联网延伸,形成了互联网社会支持(online social support)。互联网社会支持的概念基本上沿用了“面对面”线下社会支持的表述方式和理论资源,并被认为是可以克服线下社会支持的一些不足,^⑤由于在网络上不需要表明真实身份,因此它是提供支持的绝佳场域。^⑥近几年,有关互联网社会支持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具体社群的研究,如医疗患者、青少年群体等。

在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学者们亦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对其社会支持的影响上。互联网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积极作用被不断印证,“对于行动受限的老人而言,互联网技术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持,帮助他们维持自身的社会网络并从中获益”,^⑦“掌握更多的电脑技

①A. Vaux, *Social Support: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8, p. 1. J.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pp. 299 – 300;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09—415页。

②S. Cobb,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Vol. 38, No. 5, 1976, pp. 300 – 314.

③M. G. Habe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eported 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 meta-analyt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39, 2007, pp. 133 – 144.

④B. R. Burleson, T. L. Albrecht & I. G. Sarason,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 xvii – xix.

⑤P. J. Dunham, A. Hurshman & E. Litwin, et al., “Computer-mediated social support: Single young mothers as a model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26, No. 2, 1988, pp. 281 – 306.

⑥K. D. Mickelson, “Seeking Social Support: Parents in Electronic Support Groups”, in S. Kiesler (ed.),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Mahwah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p. 157.

⑦N. G. Choi & D. M. Dinitto,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Low-income Homebound Older Adults: Internet Use Patterns, eHealth Literacy, and Attitudes toward Computer/Internet Use”,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Vol. 15, No. 5, 2013, p. e93.

术可以让老年人变得更独立,更善于交往,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①“互联网的使用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感”,^②“老年人倾向于用互联网来进行沟通并寻求信息,随着其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其社会融入感亦会相应提升”。^③当然,并非所有相关研究都得出类似积极的显著效果。^④

互联网对于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有何意义,能否真正帮助他们增权益能,并不能一言蔽之,效果的呈现还需要具体考察老年人自身作为主动的行动者,其互联网接触的动机以及具体使用行为。就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的流动人群而言,地理上的迁移既从某种程度上割断了地缘的联系,又打破了个体以往持久的交往。尽管从家庭结构的层面来看,这种迁徙带来了从核心家庭向主干或联合家庭的回归,老人与儿孙辈之间有了更多交流的时间,但在儿辈忙碌于事业,孙辈牙牙学语的阶段,很多家庭内部的交流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互联网,尤其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极有可能成为随迁老人获取沟通与支持的平台。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问题一:随迁老人的微信采纳与使用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

问题二:微信社交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随迁老人获得社会支持,为他们增权益能(empowerment)?

(三) 老年群体的“自我同一性”与活跃理论

关于老年的界定,人们惯于以年岁来划分,但从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老年的阶段性特征并不能以绝对的年岁为界限,老年意味着一定的心理发展程度以及自我角色的迁徙与再造。

埃里克森在其人格发展渐成说中将人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一种潜伏的危机。在涉及成熟期后期的老年期问题上,他认为这一阶段的危机在于自我统合与绝望的冲突。自我统合与绝望的冲突中有个核心概念,即“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同一性(identity)几乎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无所不在的概念,埃里克森将同一性概念引入心理学,现已成为发展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⑤

自我同一性来源于对自我的探究,它是心理社会加工过程,由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是内在自我之间的平衡,以及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亦是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一致性关系的反映。在老年阶段,自我同一性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老年期的生活状态与质量。^⑥能获得自我统合状态的老年人,满意自己的人生,将老年视为必然且有意义的过程;而无法在“自我同一性”上获得统合的老年人,会表现出绝望的状态。^⑦

随着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角色”的退出,使其自我的满足感降低,普遍存在“自我同一性”危机。^⑧个体进入老年阶段以后,从社会舞台的

①T. Heart & E. Kalderon, “Older Adults: Are They Ready to Adopt Health-related 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Vol. 82, No. 11, 2013, pp. 209 – 231.

②H. Blazun, K. Saranto & S. Rissanen, “Impact of Computer Training Courses on Reduction of Loneliness of Older People in Finland and Sloveni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28, No. 4, 2012, pp. 1202 – 1212.

③J. Erickson & G. M. Johnson, “Internet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ness during Late Adulthood”,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Vol. 30, No. 12, 2011, pp. 197 – 209.

④H. White, E. McConnell & E. Clipp,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f Providing Internet Training and Access to Older Adults”, *Aging & Mental Health*, Vol. 6, No. 3, 2002, pp. 213 – 221.

⑤郭金山:《西方心理学自我同一性概念的解析》,《心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2期。

⑥S. Poole & J. Snarey, “Erikson’s Stages of the Life Cycle”, in S. Goldstein & J. A. Naglieri (eds.),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Springer, 2011, pp. 599 – 603.

⑦K. D. Wagner, R. P. Lorion & T. E. Shipley, “Insomnia and Psychosocial Crisis: Two Studies of Erikson’s Developmental Theor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51, No. 4, 1983, pp. 595 – 603.

⑧陈涛:《老年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中心逐渐退场,他们需要从自身在青年、中年期形成的角色模式中抽身以适应社会对于老年人角色模式的定义,需要投入精力、时间去适应这些挑战,对自身进行新的整合与接纳。^① 老年人将不断地调整,重新定义“自我”,在新的“自我”认知和支持之下,获得老年阶段的自我同一性的统合。如果他们不能适应新的角色体系,那将对老年生活产生厌恶、失望感。^② 个体间体质、脾性、气质不同,其对于老年期的接受度以及适应程度亦有所差异。

如何使老年人在年岁渐长的过程中得以顺利过渡,建构起其新的意义脉络,进而重新定义“自我”与实现自我同一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活跃理论认为,老年人的“自我”是在与个体和环境的不断互动中被确认的,积极的社会活动能够显著增强老年人的自我认知、提高其生活质量。^③ 活跃理论从个体行为的社会适应性出发,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较高的融入程度可以给老年生活带来正面效应,即若老年人能以积极的状态投入老年生活,参与多种社会活动,积极维持、建构社会联系,那么其老年生活将更为顺畅。^④ 活跃理论将老年人的自我同一性与其个人的调节、活动水平联系了起来:老年人在活动中积极寻找生活的乐趣和晚年生活的意义,因而社会活动越活跃的老年人,其自我同一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使用活跃程度来表征老年人的自我同一性特征。

正如老年人本身的脾性气质,及其在老龄化过程中“自我同一性”的平衡程度,会影响到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以及行动一样,这些个体因素在互联网平台上依然可能是影响老年人互联网实践及其支持获得的关键。据此,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

问题三:随迁老人微信社会支持的获得与其自我同一性特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江苏省南京、苏州、常州、南通、盐城多地展开并针对老年群体调研,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春节期间被派往江苏省多个地市(大部分是他们的家乡),范围涵盖苏北、苏中及苏南区域,调查对象为60岁及以上在城市居住的老年人。

研究未将研究对象局限于随迁老人,希望通过老年群体间和老年群体内的比较,来考察迁徙因素对老年新媒体接触与互联网社会支持获得的影响。

在调查中,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受访者自己填写与调查员持问卷逐一询问并代为填写两种方式结合进行。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576份,其中有效问卷490份,有效样本率为85.1%。本研究采用SPSS23.0进行因子分析、描述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及相关与回归分析。

(二) 样本特征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70.4岁($SD = 1.15$),其中随迁老人 $M = 69.65$, $SD = 1.18$,非随迁老人 $M =$

①Q. S. Cavan, E. W. Burgess & R. J. Havighurst, et al., *Personal Adjustment in Old Age*, Chicago: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 1949, p. 204.

②R. J. Havighurst & R. Albrecht, *Older Peopl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3. pp. 5 - 10.

③J. Diggs, “Activity Theory of Aging”, in S. J. Loue & M. Sajatovic (eds), *Encyclopedia of Aging and Public Health*, New York: Springer, 2008, pp. 79 - 81.

④G. L. Maddox, “Persistence of Life Style among the Elderl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tterns of Social Activity in Relation to Life Satisfaction”, in B. L. Neugarten (ed.), *Middle Age and Aging: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181 - 183.

70.7, $SD = 1.13$; 性别比例较为均衡, 男性占比 50.0%, 女性占比 50.0%, 其中随迁老人女性占比 47.5%, 非随迁老人女性占比 49.9%; 文化程度上, 随迁老人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居多, 占 33.8%, 非随迁老人初中学历居多, 占 33.0%; 婚姻状况较为一致, 随迁老人与非随迁老人绝大多数为已婚人士, 占比均为 83% 左右; 子女数量平均为 1.75 个 ($SD = 0.82$), 其中随迁老人 $M = 1.67$, $SD = 0.86$, 非随迁老人 $M = 1.78$, $SD = 0.80$; 收入水平上, 随迁老人中位数为 3001—5000 元, 非随迁老人中位数为 1001—3000 元。

(三) 变量测量

1. 自变量

(1) 微信采纳与使用。参考周裕琼等学者对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的量表,^①并对其加以修改 ($KMO = 0.93$, $Cronbach's \alpha = 0.94$)。微信采纳的测量具体为对微信使用年限的提问, 了解其首次使用微信的时间。微信使用的测量包含两个方面, 即微信日均使用频率与微信使用熟练程度。其中, 微信使用熟练程度包含 20 个问题, 囊括了微信使用中的常用功能。

(2) 自我同一性。如前所述, 本研究将参考活跃程度来表征老年人的自我同一性特征。活跃程度的测度援引庄曦^②的量表, 通过列举老年人可能参加的线下活动来测量其社会活跃程度 ($KMO = 0.81$, $Cronbach's \alpha = 0.75$)。活跃程度高的老年人, 其自我同一性越强。

(3) 社会支持需求。参考 Cutrona^③对社会支持的分类, 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陪伴支持及工具支持; 参考吴捷对社会支持需求的研究,^④结合老年人特性, 制定本研究社会支持需求量表 ($KMO = 0.87$, $Cronbach's \alpha = 0.87$)。

2. 因变量

因变量为受访者感知到的互联网社会支持。参考 Cutrona 对社会支持的分类, 将感知到的互联网社会支持分为情感、信息、陪伴及工具支持四大类。但在问卷的前测及正式调查中, 受访者对互联网工具类社会支持几乎未有提及, 结合老年群体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对互联网社会支持的探讨最终集中于情感类支持、信息类支持及陪伴类支持三个方面。

在参考过往研究基础上,^⑤结合老年人的特性, 制定了本研究的老年人互联网社会支持量表。 ($KMO = 0.91$, $Cronbach's \alpha = 0.91$) 测量包括 11 个题项, 涵盖社会支持的三个类别。问题的选项分为“从未感知到”“很少感知到”“有时感知到”“经常感知到”“总是感知到”五类, 分别赋值为 1 至 5。每类问题得分相加取平均值作为受访者该类互联网社会支持的数值, 数值越高, 表明获得了更多的互联网社会支持。

采用主成分法对该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得到 3 个因子: 因子 1 为情感类互联网社会支持, 包含 3 个题项; 因子 2 为信息类互联网社会支持, 包含 3 个题项; 因子 3 为陪伴类互联网社会支持, 包含 5 个题项。11 个因子负荷值均高于 0.6, 全部可解释方差为 71.6%, 详见表 1。

①周裕琼:《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 年第 7 期。

②庄曦:《城市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接触与鉴别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③C. E. Cutrona & J. A. Suhr, “Controllability of Stressful Events and Satisfaction with Spouse Support Behavio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19, No. 2, 1992, pp. 154–174.

④吴捷:《城市低龄老年人的需要、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153—155 页。

⑤梁晓燕:《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11—112 页; W. Chen & A. S. K. Choi, “Internet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Chinese Migrants in Singapore”, *New Media & Society*, Vol. 13, No. 7, 2011, pp. 1067–1084.

表 1 互联网社会支持探索性因子分析

问卷问题	(感知到的互联网社会支持)		
	情感类	信息类	陪伴类
(1)感到孤独或心情不好时能通过网络向他人倾诉	0.84		
(2)情绪低落时通过网络得到别人的关心与鼓励	0.84		
(3)在虚拟社区中发表言论,会得到他人的回复或赞同	0.65		
(4)通过网络交往可以从他人处获得新的生活信息		0.81	
(5)在网上能得到需要的健康信息		0.79	
(6)在网络交流中了解自己不知道或没去过的地方		0.78	
(7)通过网络与自己兴趣相投的人聊天			0.85
(8)在网上交流共同的兴趣爱好			0.85
(9)通过网络与他人分享彼此的思想、感受、体验			0.71
(10)现实中难以说的话可以在网络中说出来			0.66
(11)在网上可以和别人相互探讨感兴趣的内容			0.62
特征值	2.26	2.51	3.11
可解释方差(%)	20.52	22.84	28.24
全部可解释方差(%)	71.60		

四、研究发现

(一) 随迁与非随迁老人的微信采纳与使用情况

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老年人整体微信采纳情况良好,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使用微信超过两年,18.6%的受访者使用微信不超过半年。从微信使用情况看,老年人的微信使用水平不高,69.2%的受访者每天使用微信的频率在2个小时以下,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对微信的各项功能用得不够,只有22.7%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能熟练使用微信。

1. 随迁老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均更为积极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基于流动的需求,随迁老人在微信采纳与使用中更为积极。

随迁老人的微信采纳的平均值(M = 4.13,SD = 1.63)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3.30,SD = 1.74),t = 4.85,p < 0.001。在微信使用方面,无论是微信日均使用频率还是使用熟练程度,随迁老人的平均值都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随迁老人的微信日均使用频率(M = 2.24,SD = 1.03)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1.99,SD = 1.04),t = 2.44,p < 0.05;随迁老人的微信使用熟练程度(M = 2.17,SD = 0.62)也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1.99,SD = 0.64),t = 2.73,p < 0.01。可见,是否处于随迁状态对微信的采纳与使用均有着显著的影响。

表 2 微信采纳与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微信采纳	随迁老人	4.13	1.63	4.85 ***
	非随迁老人	3.30	1.74	
微信日均使用频率	随迁老人	2.24	1.03	2.44 *
	非随迁老人	1.99	1.04	
微信使用熟练程度	随迁老人	2.17	0.62	2.73 **
	非随迁老人	1.99	0.6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随迁老人的微信使用更为多元与熟练

为了进一步探究在微信功能使用上存在哪些具体差异,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问卷中涉及的20项微信功能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随迁老人与非随迁老人在8项微信功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T 检验结果见表3(限于篇幅,表中只呈现存在显著使用差异的8项微信功能)。

在视频、文字聊天这些基础功能方面,随迁老人的平均值均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即对微信基础功能的使用更为熟练:随迁老人视频即时聊天平均值($M = 2.68, SD = 0.61$)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2.53, SD = 0.66$), $t = 2.23, p < 0.05$;随迁老人文字输入聊天平均值($M = 2.50, SD = 0.69$)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2.34, SD = 0.72$), $t = 2.25, p < 0.05$ 。

此外,相较于非随迁老人,随迁老人在点赞评论朋友圈等社交功能使用均值较高,且在订阅、阅读、转发公众号及主动搜索信息方面更为熟练,显示出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

表 3 微信功能独立样本 T 检验

检验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视频即时聊天	随迁老人	2.68	0.61	2.23 *
	非随迁老人	2.53	0.66	
文字输入聊天	随迁老人	2.50	0.69	2.25 *
	非随迁老人	2.34	0.72	
点赞评论朋友圈	随迁老人	2.41	0.71	3.35 **
	非随迁老人	2.16	0.77	
转发公众号文章	随迁老人	2.04	0.77	3.05 **
	非随迁老人	1.80	0.76	
阅读公众号	随迁老人	2.20	0.76	3.02 **
	非随迁老人	1.97	0.76	
订阅公众号	随迁老人	1.96	0.77	2.54 **
	非随迁老人	1.77	0.75	
搜索信息	随迁老人	1.99	0.77	3.36 **
	非随迁老人	1.73	0.76	
微信转账	随迁老人	2.19	0.81	2.53 *
	非随迁老人	1.98	0.82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3. 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变量对随迁老人的微信采纳与使用存在一定影响

表 4 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子女数量和微信的采纳或使用存在相关。其中,月收入、文化程度与微信的采纳和使用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子女数量与微信的采纳和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婚姻状况与微信的采纳存在显著负相关。

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月收入越高的随迁老人,其微信采纳时间更早、使用微信更为熟练;处于已婚或同居状态的随迁老人微信采纳更积极,但微信的使用频率与熟练程度不突出;年龄小、子女数量少的随迁老人,微信采纳与使用更为积极。

表 4 随迁老人人口统计变量与微信采纳及使用的相关性分析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月收入	子女数量
微信采纳	0.02	-0.26 **	0.39 ***	-0.23 **	0.41 ***	-0.44 ***
微信日均使用频率	0.05	-0.17 *	0.12	-0.04	0.22 **	-0.23 **
微信使用熟练程度	0.11	-0.37 ***	0.36 ***	-0.15	0.31 ***	-0.29 **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二) 随迁老人与其互联网社会支持

1. 随迁老人从互联网中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相较于非随迁老人,随迁老人在情感、信息及陪伴类别均获得了更多的互联网社会支持。互联网情感支持方面,随迁老人平均值($M = 2.20, SD = 0.95$)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1.91, SD = 0.80$), $t = 3.39, p < 0.01$;互联网信息支持方面,随迁老人平均值($M = 2.78, SD = 0.83$)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2.48, SD = 0.86$), $t = 3.45, p < 0.01$;互联网陪伴支持方面,随

迁老人平均值(M = 2.40,SD = 0.92)显著高于非随迁老人(M = 2.14,SD = 0.89),t = 2.89,p < 0.01。

就随迁老人所获得的互联网社会支持而言,在网络上能得到需要的健康信息(M = 3.18,SD = 0.91)、在网络中了解自己不知道或没去过的地方(M = 3.10,SD = 1.01)、通过网络交往可以从他人处获得新的生活信息(M = 2.76,SD = 1.07)等条目居于前列。

表 5 互联网社会支持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互联网情感支持	随迁老人	2.20	0.95	3.39 **
	非随迁老人	1.91	0.80	
互联网信息支持	随迁老人	2.78	0.83	3.45 **
	非随迁老人	2.48	0.86	
互联网陪伴支持	随迁老人	2.40	0.92	2.89 **
	非随迁老人	2.14	0.89	

注: ** p < 0.01。

2. 人口统计变量、微信采纳与使用等因素影响了随迁老人的互联网社会支持

本研究采用阶层回归的方法进行了四级阶层回归分析。研究将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微信采纳与使用、社会活跃程度、社会支持需求等作为自变量,分别预测随迁老人所获得互联网社会支持的三种类别,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6,表内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 6 随迁老人互联网社会支持的多阶层回归分析

自变量/因变量	互联网社会支持		
	情感类	信息类	陪伴类
人口统计变量			
性别(1 = 男性)	-0.01	-0.02	-0.05
年龄	-0.35 **	-0.27 **	-0.41 ***
文化程度	0.07	0.16	0.14
婚姻状况(1 = 未婚/离异/其他)	0.16	0.20 *	0.22 *
月均收入	0.02	0.07	0.06
子女数量	0.05	-0.09	-0.04
R ² (%)	10.7	15.8	21.3
微信采纳与使用			
微信采纳	0.02	-0.03	0.10
微信日均使用频率	0.11	0.21 *	0.21 *
微信使用熟练程度	0.16	0.20	0.21 *
R ² (%) 增量	4.2	8.3	12.6
社会活跃程度			
社会活跃程度	0.09	0.23 *	0.19 *
R ² (%) 增量	0.6	4.1	2.6
社会支持需求			
情感类需求	0.13	-0.12	0.01
信息类需求	0.08	0.22 *	0.07
陪伴类需求	0.05	0.17	0.03
工具类需求	-0.10	0.03	0.05
R ² (%) 增量	3.5	6.3	1.2
总的 R ² (%)	19.0	34.5	37.7

注:表内数字为所有变量均输入回归方程后,最终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结果显示,微信采纳与使用对互联网社会支持具有较强的预测力,集中体现在信息类和陪伴类社会支持上。其中,微信日均使用频率(信息类 $\beta = 0.21$, $p < 0.05$;陪伴类 $\beta = 0.21$, $p < 0.05$)对信息类、陪伴类支持均具有正向预测力,微信使用熟练程度(陪伴类 $\beta = 0.21$, $p < 0.05$)对陪伴类支持具有正向预测力。这表明日均使用微信时间较长、对微信各项功能使用更熟练的随迁老人更容易通过

互联网获取社会支持。微信采纳时长则对三类支持均无预测力,说明使用微信的年限长短不能直接影响互联网社会支持的获得。

社会支持需求整体对互联网社会支持预测力一般,仅信息类需求(信息类 $\beta = 0.22, p < 0.05$)对信息类支持具有正向预测力,信息类社会需求较高的随迁老人,更可能通过互联网来实现其信息方面的诉求。

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变量对互联网社会支持具有较为显著的预测力。年龄对三类支持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情感类 $\beta = -0.35, p < 0.01$;信息类 $\beta = -0.27, p < 0.01$;陪伴类 $\beta = -0.41, p < 0.001$),年龄越小的随迁老人可能获得更多的互联网社会支持。婚姻在预测互联网社会支持时同样具有显著作用,对信息类支持与陪伴类支持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息类 $\beta = 0.20, p < 0.05$;陪伴类 $\beta = 0.22, p < 0.05$),即处在未婚、离异或独居等状态的随迁老人可能获得更多的互联网社会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采纳与使用、社会支持需求这两类变量对情感类互联网社会支持的预测力都不明显。

(三) 随迁老人的自我同一性特征与其微信社会支持

1. 自我同一性程度高的随迁老人,更主动地接受和使用新媒体

本研究尝试以活跃程度来表征随迁老人的自我同一性程度。数据显示,随迁老人的自我同一性程度与其微信的采纳($p < 0.001$)与使用($p < 0.001$)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受新媒体,并借助新媒体拓展社交、尝试新功能。

2. 自我同一性程度高的随迁老人,更易获得互联网社会支持

如表6所示,由活跃程度(信息类 $\beta = 0.23, p < 0.05$;陪伴类 $\beta = 0.19, p < 0.05$)表征的自我同一性程度对互联网社会支持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对信息类与陪伴类支持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情感类支持预测力不显著。

随迁老人的自我同一性程度可以影响其获得的互联网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程度高的随迁老人,因其社会活动的活跃、角色调适的成功,更容易通过互联网得到有效的社会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1)技术的普及和使用是一个不均衡的赋权过程,由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所带来的“数字鸿沟”在随迁老年群体中差异明显。但相较于非随迁老人,随迁老人的微信使用总体更为多元与熟练,互联网在其生活中起到了更多的增权益能的作用。

从媒介丰富度理论的视角来看,媒体丰富与否是伴随着技术所带来的固有属性,如果一种媒体能够确保及时反馈,采用多元渠道,传递多元线索,那么它在沟通中就更为有效。^① 老年人社交手段的网络化将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社会联系,有助于他们在老年化的过程中融入社会。^② 随迁老人是人口流动中的特殊社会行动者,成功的社会化是他们顺利融入社会的基础,如何及时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情境进行自我反思、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以保持互动持续性,是他们社会融入的主要内

^①R. L. Daft & R. H. Lengel,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Media Richness and Structural Desig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32, No. 5, 1986, pp. 554 – 571.

^②T. Heart & E. Kalderon, “Older Adults: Are They Ready to Adopt Health-related 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Vol. 82, No. 11, 2013, pp. 209 – 231.

容。^①因此,随迁老人在点赞评论朋友圈等社交功能使用均值较高,在订阅、阅读、转发公众号及主动搜索信息方面更为熟练,有着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且相较于非随迁老人,随迁老人在情感、信息及陪伴类别中均获得了更多的互联网社会支持。

但在随迁老人群体内部,年龄、文化程度及收入水平对于老人的微信采纳及使用仍有一定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使用在老年群体内部同样是一个不均衡的赋权过程,年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所带来的“数字鸿沟”在随迁老年群体中同样存在。在互联网时代,基于互联网使用的“知沟”将会进一步拉大。^②因此,针对高龄老人以及文化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人,开展必要的媒介素养干预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微信社交以社交补位的方式,帮助随迁老人群体于虚拟空间弥合实体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线下联系的再聚合与再拓展;但自我同一性等现实个体差异仍然影响着该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其获得的互联网社会支持。

老年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自我角色的迁徙与再造,同样也是既有社交圈趋向新社交圈转移的过程。本文所研究的随迁老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前后,这一群体年轻时大多有过集体的生活经历,大家每天一起劳作、一起吃饭。“集体式”的成长语境使老年人习惯于群体交流模式。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开放式的集体语境逐渐被封闭式的小家庭结构所取代,随迁老人身边缺少具有共同话题、可以随时说话的对象,成了较为普遍现象。由于空间距离等因素,随迁老人与家乡同辈好友面对面的聚会也难以实现。

微信社交从这一层面而言实现了社交补位的作用,帮助随迁老人群体实现线下联系的再聚合、再交叉与再拓展。不少受访的随迁老人都有微信群,包括好友群、同学群、兴趣群、知青群、战友群等等。以微信群为代表的虚拟社区可以为老人们提供时时在场的“聚会”空间,为他们提供充满“集体记忆”的交流与活动场景。虚拟社区中的共同行动提供了连接个人与集体潜意识的途径。同辈社交网络的在线拓展有助于提升随迁老人群体的社会活跃程度,进而促进其自我同一性的协调。

同时,随迁老人对微信的采纳及其在新媒体平台上所获得的支持与老人本身的自我同一性指标亦有关联。老年群体通过对人生的回顾与思考,通过心理加工机制同化和顺应现实遇到的问题,^③获得整合的、连续的自我,最后接纳自我。自我同一性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控制感更强,更会主动接受并借助新媒体拓展社交,尝试新功能。在微信中表现更活跃的个体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反馈,从而愈加活跃。他们的积极互动和分享能够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讨论。可见,互联网即时通讯的技术改变了人际互动和交流方式,但“虚拟空间”尚不能完全取代现实生活,随迁老人群体社会支持的有效获取还有赖于社区、家庭、线上线下多元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及推进。

(3)微信社交对随迁老人情感类互联网社会支持的提升效果有限,家庭内、代际间的深度沟通仍是增进随迁老人归属感、幸福感,真正实现老有所依的重要路径。

近十多年来,我国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率在2014—2015年间出现了陡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微信推出了红包功能,家庭成员间节假日的红包助兴,让不少老年人跃跃欲试参与其中。于社交平台还原全家团聚、其乐融融的场景,是不少老年人尝试使用微信的初衷。但本轮研究结果显示,尽管随迁老人,尤其是子女数量较少的随迁老人在微信采纳与使用中有着更为积极的尝试,微信社

①郑佳然:《流动老年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6位“北漂老人”流迁经历的质性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②L. Wei & D. B. Hindman, “Does the Digital Divide Matter More?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Use on the Education-Based Knowledge Gap”,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14, No. 2, 2011, pp. 216 – 235.

③P. T. Wong, “Personal Meaning and Successful Aging”, *Canadian Psychology*, Vol. 30, No. 3, 1989, pp. 516 – 525.

交等因素对于情感类支持的预测力却并不明显。部分随迁老人表示,“微信里经常聊天的还是几个老朋友”“和子女们聊得不多”“我们发的一些问候信息、一些有趣的事情,孩子们好像不是太感兴趣”“一般和孩子们发得多的是几点接送孙女上学、放学”。随迁老人们虽然陪伴子女迁徙,且多与子女住在一起,但其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仍较为有限。面对子女每天的忙碌状态,老年人即使想要与晚辈说说话也显得十分谨慎,生怕耽搁他们的“正事”,怕“过多占用他们的时间”。同时,随迁老人难以与子辈的数字化生活同步,代际间交流的文化障碍也可能进一步加深。

随迁老人们为了子辈背井离乡,更倾向于将情感全部投射在家人身上。但不论是面对面还是在线上,代际间的深度沟通依然有限。就技术反哺角度而言,子女多是完成了对随迁父母在新技术使用中的入门级培训,但交流多在应用物质层面,情感交流与陪伴支持的体现不足。家人的支持对老年群体而言不仅是新技术的分享,更多的是赋予他们情感的纽带、爱的愉悦。我们都将老去,在流动性的社会中,如何让仍在负重前行的随迁老人老有所依,尤其是在情感与陪伴层面有所依托,推进线上线下代际间的深度文化沟通与反哺、友辈间的多元互动,仍然是个重要的命题。

(责任编辑:张 升)

The Migrant Elderly and Virtual Social Interaction: Investigating the Internet Use and WeChat Social Support among Chinese Elderly Migrants

ZHUANG Xi

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elderly migrant populat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urban spaces characterized by mobility, aging, and digitization, the migrant elderly face challenges of de-embedding and re-embedding as they migrate with their offspring. Compared with other elderly people, the migrant elderly use WeChat with greater proficiency. WeCha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mpowering them, particularly through supplementing their social connections, helping this group bridge the gap between physical distances in virtual spaces, and to some extent, facilitating the re-aggregation and expansion of offline relationships. Howeve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use of technology is an unbalanced process of empowerment. Persist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continue to affect this group's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support on Internet platform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se "elder drifters" who are still overwhelmed by heavy burden of life have a reliable support system, the top priority should be the construction of diverse support networks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as well as multi-dimensional in-depth communic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friends.

Keywords: the migrant elderly; WeChat; virtual community; online social support

About the authors: ZHUANG Xi, PhD in Communication, is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and Dean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